心理学报 2021, Vol. 53, No. 3, 244−258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https://dx.doi.org/10.3724/SP.J.1041.2021.00244

消除威胁或无能狂怒？自恋对暴力犯攻击的影响机制*

刘宇平[1] 李姗珊[2] 何 赟[2] 王豆豆[2] 杨 波[2]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2]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 通过2个研究探索了自恋与暴力犯攻击行为的关系及机制。研究1通过问卷法(N = 498)发现，自恋与攻击存在正相关，特质愤怒在自恋与预谋性和冲动性攻击间的中介作用成立，心理特权的中介作用只对预谋性攻击成立。研究2对90名暴力犯进行了行为学实验，结果表明威胁感和负性情绪在自恋与攻击间起中介作用，挑衅调节了上述中介作用。显性自恋者只在挑衅条件下表现出更强的攻击性，隐性自恋者则在挑衅和无挑衅条件下均有较强的攻击性。研究厘清了不同亚型下自恋与攻击的关系，突出了隐性自恋的"黑暗性"，并为罪犯矫治管理及犯罪预防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自恋，威胁感，负性情绪，攻击，暴力犯
分类号 B848

1 前言

自恋与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并称黑暗三人格(Dark Triad)，被认为与以攻击为代表的反社会行为存在密切的关联(Paulhus & Williams, 2002)。实证研究(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Hart, Adams, & Tortoriello, 2017; Krizan & Johar, 2015)、元分析(Rasmussen, 2016)及系统综述(Lambe et al., 2018)都表明，自恋与攻击之间存在正相关。但自恋与攻击的关联依然存在着很多争议和不明确之处：自恋者希望得到外界的良好评价，有提升个人形象的需求，为此，他们会对自己的行为加以克制，做出较少的反社会行为或更多的亲社会行为(秦峰，许芳，2013)。在一些研究中，自恋与攻击的相关不显著(Bushman et al., 2009)，甚至存在着负相关(Chen, 2015)，使得自恋的"黑暗"属性在学界一直存在着一定的争议(Rauthmann, 2012)。在机制方面，早期的研究认为自恋者在受到挑衅(provocation)时，为了消除来自外界的威胁会产生攻击(Bushman & Baumeister, 1998)，Krizan和Johar (2015)则提出自恋者的攻击是为了宣泄负面情绪。此外，自恋者的攻击是否一定需要挑衅的诱发同样存在一定的争议(Reidy et al., 2010)。这表明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及背后机制较为复杂，以往研究也可能存在不足之处。因此，我们需要开展更全面、更深入的研究以厘清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及其作用机制。

在人格心理学领域，自恋常被分为显性自恋(overt narcissism)和隐性自恋(covert narcissism)两种亚型，二者都表现出对自身的过度关注，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显性自恋与自我夸大的感觉有关，持续需要别人的积极关注，表现为自大、夸张的表演与自我展示，又被称为夸大型自恋(grandiose narcissism)；隐性自恋者会把关注指向自身，同时伴随着自我扩张，表现出自卑，对他人的评价感到敏感，具有高焦虑和不安全感，又被称为脆弱敏感型自恋(vulnerable narcissism) (Miller et al., 2011; Wink, 1991)；攻击也可以被分为有计划、有意识的预谋性攻击(premeditated aggression)和在面对刺激

收稿日期: 2020-06-09
*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8YFC0831002)资助。
通信作者: 杨波, E-mail: zsdybo@sina.com

或在激怒状态时, 个体丧失控制而产生的冲动性攻击(impulsive aggression) (Stanford et al., 2003)。这大大增加了自恋与攻击关系的复杂性。但以往相关主题的研究没有对亚型做很好的区分, 尤其是对隐性自恋的关注较少。隐性自恋被认为代表着自恋的非适应性(Schoenleber et al., 2011), 显性自恋则具有适应与非适应的两面性(余震坤 等, 2019)。隐性自恋与精神异常、情感问题及人格障碍的关联均大于显性自恋(Miller et al., 2011)。元分析的结果也表明, 相比于显性自恋, 隐性自恋与攻击存在着更强的相关, 但全文共分析了 68 项研究, 仅有 5 项与隐性自恋有关(Rasmussen, 2016)。在另一项自恋与攻击主题的系统综述中, 25 篇被选入的研究也仅有 2 篇与隐性自恋有关(Lambe et al., 2018), “黑暗三人格”的定义和测量对隐性自恋的关注也十分有限(Maples et al., 2014)。上述结果表明, 隐性自恋对反社会行为和适应不良行为有重要的预测作用, 但以往的研究却对它关注甚少。同时, 以往的研究在被试和方法的选择上存在局限。自恋以“黑暗人格”著称(Paulhus & Williams, 2002), 攻击也是典型的反社会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 现有研究却大多是在正常人群中开展的, 其中以大学生为主。此外, 自恋受文化差异影响较大,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开展自恋主题的研究也很有必要(Li et al., 2016)。国内尚没有在罪犯等具有典型“黑暗性”特点及较多反社会行为的人群中对自恋与攻击的关系及机制进行研究; 国外仅有的几项以罪犯为被试的研究, 数据来源也都是自陈式问卷或既往犯罪史, 缺少实验研究(Schoenleber et al., 2011), 对机制的探讨十分有限, 很难深入地解释自恋影响攻击行为产生的过程。

Anderson 和 Bushman (2002)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指出, 在人格和情境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个体的认知、情绪等内在过程会发生变化, 进而诱发攻击行为。这表明, 情绪和认知因素在自恋人格与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情境则对这一过程起调节作用。前人研究也大多是从认知、情绪或情境角度出发对自恋与攻击的关联进行了解释, 指出自恋者在受到挑衅时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 并提出了强调认知成分的“自我威胁理论” (Bushman & Baumeister, 1998)和关注情绪作用的“自恋暴怒理论” (Krizan & Johar, 2015)。但现有的大多数研究都只关注了认知(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Jones & Paulhus, 2010; Reidy et al., 2008)或情绪(Krizan & Johar, 2015)中的一个内在心理过程, 少有兼顾认知、情绪的整合性研究(Hart, Adams, & Tortoriello, 2017)。因此, 本研究将同时考虑情境、认知、情绪在自恋人格与攻击行为间的综合作用机制。

1.1　认知: 自我威胁理论

研究者们最初提出了自我威胁理论(threatened-egotism), 从认知角度解释了自恋与攻击关联的机制。该理论认为, 当自恋者夸大的自我与现实或他人的消极评价产生矛盾时, 其自我会感知到威胁感。此时, 出于捍卫地位、提升形象或报复等目的, 自恋者往往会针对破坏和怀疑其夸大自我的人实施攻击行为(Bushman & Baumeister, 1998)。后续大量实证研究进一步从不同角度证实了自我威胁理论的有效性: Jones 和 Paulhus (2010)通过模拟社会情境的方法发现, 高自恋者在自我受到威胁时, 会表现出更强的攻击行为; Hart, Adams 和 Tortoriello (2017)用模拟情境法得出威胁感在自恋与攻击间起中介作用; Krizan 和 Johar (2015)则基于自我威胁理论, 通过问卷法检验了心理特权(entitlement)在自恋与攻击间的中介作用。心理特权是指个体感到有权利获得优待, 豁免社会责任的稳定而普遍的主观信念或知觉, 是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 高心理特权的个体常常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优越、存在着被优待的特权(Campbell et al., 2004)。但在现实中, 这样不切实际的信念很容易被推翻, 个体越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特权, 现实便越容易违背他们的期望(Reidy et al., 2008), 其膨胀的自我便会感知到更多的威胁感, 进而引发攻击行为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并恢复膨胀的自我(Bushman & Baumeister, 1998)。不难看出, 自我威胁理论解释的攻击并不是由爆发式情绪诱发的冲动性攻击, 而是有明确目的和计划的预谋性攻击。

1.2　情绪: 自恋暴怒理论

自我威胁理论主要从认知角度对自恋与攻击的关联进行了解释, 难以解释情绪的作用及其对冲动性攻击的影响(Schoenleber et al., 2011), 自恋暴怒理论(narcissism rage)可以较好地对其进行补充。当自恋者膨胀却脆弱的自我受到挑战时, 会产生愤怒、羞耻、感觉悲伤或受到伤害等一系列负面情绪, 称为自恋暴怒, 在强烈的负性情绪作用下, 个体会行为失控, 产生攻击行为(Krizan & Johar, 2015)。从理论上来看, 这种攻击是个体对于激惹和挑衅的一种即时性反应, 一般是冲动性攻击。Krizan 和 Johar

(2015)以自恋暴怒理论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问卷和实验研究，结果表明，负性情绪较好地解释了自恋与攻击间的关联。具体来说，在受到挑衅时，隐性自恋可以有效地引发个体包括愤怒、不信任、抑郁等在内的负面情绪，进而导致反应性攻击和替代性攻击。未受挑衅时，上述预测作用不成立。显性自恋则在挑衅和非挑衅条件下均未表现出对负性情绪和攻击行为的预测作用。另有研究表明，显性自恋与攻击行为的关联同样与负面情绪有关(Li et al., 2016)。Hart, Adams 和 Tortoriello (2017)的研究表明，在控制了自我威胁理论的相关变量后，自恋暴怒理论对自恋与攻击的关联依然有良好的解释作用。

1.3 情境：挑衅的调节作用

自恋人格在引发个体认知、情绪变化时，受到一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挑衅的影响。尽管有研究显示，无论是否受到挑衅，自恋者都会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Reidy et al., 2010)，但更多研究(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Krizan & Johar, 2015)及元分析(Rasmussen, 2016)表明个体在受到挑衅时自恋与攻击关系的效应量大于未受挑衅时，即挑衅在自恋与攻击之间起调节作用。高自恋者具有膨胀且不稳定的自我意识(Miller & Maples, 2012)，根据自我威胁理论和自恋暴怒理论，他们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过程中很容易自尊受损、感觉难堪或感受到威胁，同时产生负面情绪。上述过程在个体没有受到挑衅时常常得不到体现，一旦受到挑衅便会突显出来，个体出于消除威胁、保持形象、维护地位等目的，并在愤怒等负面情绪的驱使下会产生攻击行为。

综上所述，自恋与攻击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威胁感和负面情绪分别从认知和情绪方面中介了自恋对攻击的影响，挑衅则调节了自恋影响威胁感和负性情绪的过程。认知和情绪是不同的心理过程，二者之间的关联也往往是相互，而非单向的(Anderson & Bushman, 2002)。因此，我们选择建立并行式的多重中介而非链式中介模型(详见图 1)，以往的研究也大多采用相同的方法构建模型(Hart, Adams, & Tortoriello, 2017; Krizan & Johar, 2015)。此外，不同的攻击类型，机制也可能有所差别，威胁感主要解释预谋性攻击的产生，冲动性攻击则更多被负性情绪所解释。

1.4 本研究

基于以往研究基础并针对其中不足，本文在罪犯群体中开展自恋与攻击关系的研究。监狱中的心理治疗手段大多是围绕个体的自我意识开展的，罪犯的攻击行为也给监管和改造带来了困难并造成了安全隐患，因此自恋与攻击关系的研究可以为实践部门提供借鉴。暴力犯在监狱中占比较高，与攻击行为的关联最为密切，造成的狱内风险较大，因此本研究将选取暴力犯为研究对象。

研究 1 采用问卷法，从特质层面对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及机制进行探索，依据自我威胁理论和自恋暴怒理论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对自恋和攻击的亚型进行区分，比较机制的异同。自恋被分为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攻击则根据属性分为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愤怒是攻击行为产生的主要情绪因素(Anderson & Bushman, 2002), Krizan 和 Johar (2015)基于自我威胁理论发现心理特权在自恋与攻击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因此研究 1 中，特质愤怒和心理特权将被作为中介变量纳入分析。研究 2 采用实验法，依然以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为自变量，设置了挑衅与非挑衅情境，检验挑衅在自恋与攻击间的调节作用。我们对经典的泰勒攻击范式(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Chester & Lasko, 2019)进行了改编，使其能够适应监狱环境和罪犯群体的特点，用来测量个体的攻击行为。在中介变量方面，研究 2 关注负性情绪的作用而非仅考虑愤怒，并对感知威胁感进行直接测量取代心理特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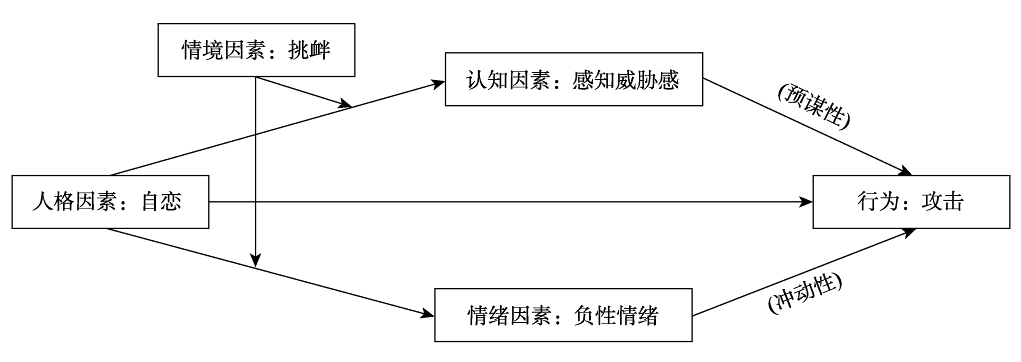


图 1 自恋与攻击关联的假设模型图

2 研究 1：问卷研究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研究 1 被试来自湖南省某男子监狱，选取的标准如下：年龄不超过 50 周岁，具有小学及以上文化水平，智力、精神、听力正常，能使用普通话进行沟通，无阅读和书写障碍。犯罪类型包括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和聚众斗殴及寻衅滋事。为了排除性及毒品等其他因素的影响，罪名中包含性犯罪以及与毒品有关的被试均被排除。共收到了 534 份问卷，剔除了缺失过多或不认真作答数据后，有效数据 498 份，有效率为 93.26%，其中有 9 人基本信息缺失。具体如下(1)年龄：范围在 18~47 岁之间，M = 34.01 岁，SD = 6.67 岁；(2)学历水平：小学学历 130 人，初中学历 296 人，高中学历 56 人，专科本科及以上 7 人；(3)刑期：死刑缓期 2 年执行者 166 人(33.95%)，无期徒刑者 122 人(24.95%)，10 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147 人(30.06%)，10 年及以下有期徒刑者 54 人(11.04%)；(4)已服刑时间：0.25~18 年，M = 6.36 年，SD = 4.88 年；(5)罪名：故意杀人罪 156 人(31.90%)，故意伤害 99 人(20.25%)，抢劫罪 113 人(23.11%)，聚众斗殴及寻衅滋事罪 25 人(5.11%)，犯多项上述罪名者 96 人(19.63%)。

2.1.2 工具

显性自恋　采用 13 题版本的自恋人格问卷(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13, NPI-13)对显性自恋进行测量。自恋人格问卷是测量显性自恋的经典工具，中文版信效度良好(王晓燕，2008)。NPI-13 是自恋人格问卷的简版，通过项目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从 40 个题项中选取了 13 项，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Gentile et al., 2013)。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 = 1.64, CFI = 0.93, IFI = 0.93, GFI = 0.97, RMSEA = 0.04，表明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6。

隐性自恋　采用过度敏感自恋量表(Hypersensitivity Narcissistic Scale, HSNS)测量隐性自恋，该问卷包含 10 个项目，为单维度量表，采取 1~5 点计分(Hendin & Cheek, 1997)，中文版信效度良好(王晓燕, 2008)。本研究中，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为：χ^2/df = 2.43, CFI = 0.92, IFI = 0.92, GFI = 0.97, RMSEA = 0.05，表明结构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量表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66。

特质愤怒　采用特质愤怒量表(The Trait Anger Scale, TAS)测量个体的特质愤怒得分，该问卷由 Spielberger (1988)编制，中文版由罗亚莉和张大均(2011)修订，包含 10 个条目、分为气质型愤怒和反应型愤怒两个因子，各 4 个题项，另有 2 个题项不属于两个因子，仅计入总分。采用 1~4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特质愤怒水平越高。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3.82, CFI = 0.95, IFI = 0.95, GFI = 0.96, RMSEA = 0.08。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8。

心理特权　心理特权问卷(Entitlement scale)由 Campbell 等(2004)编制，中文版由白杨和王佳宁(2018)修订，包含 9 个题项，采取 1~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心理特权越强。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该问卷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6.20, CFI = 0.93, IFI = 0.93, GFI = 0.91, RMSEA = 0.10。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6。

冲动性/预谋性攻击　采用冲动−预谋攻击量表(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s, IPAS)对被试的两类攻击进行测量。该问卷由 Stanford 等(2003)编制，中文版信效度良好(乔屹 等，2009)，分为冲动性攻击、预谋性攻击两个维度，共计 20 个项目，其中冲动性攻击包含 8 题，预谋性攻击包含 12 题，采用 1~5 点计分。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各有 2 个项目载荷极低，予以删除。删除后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χ^2/df = 3.42, CFI = 0.92, IFI = 0.92, GFI = 0.91, RMSEA = 0.07。冲动性攻击、预谋性攻击及总分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76, 0.86 和 0.90。

2.2 施测过程与数据处理

测试由 2 名心理学硕士和 1 名教育科骨干民警担任主试。研究 1 数据与监狱内的心理评估工作一起开展，为减少被试疲劳并减少共同方法偏差，测试分 2 批进行。研究者于 2 次监狱集体学习日(间隔一周)在教室内发放问卷并在填写后当场回收，被试被给予生活用品作为报酬。第一次施测包含显性自恋、隐性自恋问卷，第二次施测包含研究 1 的其他问卷，整个施测过程采用编号代替姓名以尽可能地保证匿名性。

使用 SPSS23.0 进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利用 AMOS 23.0 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构建，并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效应量显著性的检验。在此基础上进行效应量的合成和对比，比较显性自恋、隐性自恋对两类攻击的总效应量大小及差值的显著性。

2.3 结果

2.3.1 共同方法偏差

研究 1 的数据源自 2 批测试并尽量保证了匿名性，使用的问卷中包含了里克特式和迫选式两种作答方式，且存在部分反向计分的题目，这些措施在测量环节就减少了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周浩，龙立荣，2004)。从统计角度，我们按照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利用 SPSS 23.0 对问卷数据进行了 Harman 单因素检验，即对所有变量的共 58 个项目进行主成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未旋转前，存在 15 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 1，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 19.75%，远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2 相关与描述性统计

对暴力犯的各变量得分进行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详见表 1。结果表明，各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这为后续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和中介效应分析奠定了基础。

2.3.3 结构方程模型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为减少因潜变量项目过多导致的膨胀误差，我们根据吴艳和温忠麟(2011)的建议，对研究中的各问卷进行了打包处理。显性自恋、特质愤怒量表包含分维度，根据维度将它们各打包成了 3 个指标。对隐性自恋、心理特权及冲动性攻击和预谋性攻击这几个单维量表，则采用因子平衡法，根据题目的数量将它们各自打包为 2~3 个指标。根据前言部分的理论基础和假设，将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为自变量，特质愤怒和心理特权为中介变量，冲动性攻击和预谋性攻击为因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即为 M1。结果表明，有 3 条路径未达到显著水平，在删除了 3 条不显著路径后重新构建模型得到 M2。M1 和 M2 的拟合度对比见表 2。可以看出，M1 和 M2 的拟合度均良好，卡方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两个模型的拟合度没有显著的差异($\Delta\chi^2 = 3.40$, $\Delta df = 2$, $p = 0.183$)。为避免低估效应量并获取全面的信息，我们选择保留完整的模型(详见图 2)，进行 bootstrap 检验及效应量的合成与比较。

2.3.4 效应量的 bootstrap 检验

采用非参数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 8 条中介路径和 4 条直接路径进行显著性检验，自抽样次数为 5000。结果显示，心理特权在显性自恋/隐性自恋与冲动性攻击间的中介效应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 0，其余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直接效应方面，显性自恋对两类攻击的直接作用置信区间包含 0，直接效应不显著，隐性自恋对两类攻击直接作用置信区间不包含 0，直接效应显著(详见表 3)。

2.3.5 效应量的合成与比较

在 Bootstrap 检验的基础上对上述效应量进行合成和对比，对自恋与攻击的关系及机制进行深入的探索。尽管部分效应量较小，置信区间包含 0，但并不意味着完全不存在效应量，直接删除可能导致对效应量的低估，因此在计算总效应量时予以保留(详见表 4)。

针对以往研究对隐性自恋的忽视，我们对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的效应量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隐性自恋对冲动性攻击的总效应量显著，显性自恋对冲动性攻击的总效应量不显著(表 4)，二者差异显著($\Delta\beta = 0.37$, $SE = 0.13$, 95% CI [0.104, 0.637], $p = 0.004$)；两类自恋对预谋性攻击的总效应量均

表 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矩阵($N = 498$)

变量	M	SD	1	2	3	4	5	6
1 隐性自恋	27.40	5.83	—					
2 显性自恋	3.18	2.40	0.24**	—				
3 特质愤怒	20.13	5.35	0.39**	0.30**	—			
4 心理特权	30.62	9.54	0.24**	0.24**	0.31**	—		
5 冲动性攻击	15.91	4.87	0.38**	0.19**	0.62**	0.27**	—	
6 预谋性攻击	22.09	7.71	0.42**	0.31**	0.60**	0.35**	0.72**	—

注：*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下同。

表 2 多重中介模型拟合度指标

模型	χ^2	df	χ^2/df	RMSEA	SRMR	CFI	GFI	IFI	NFI	TLI
M1	223.24	105	2.13	0.05	0.05	0.97	0.95	0.97	0.94	0.96
M2	226.64	107	2.12	0.05	0.05	0.97	0.95	0.97	0.94	0.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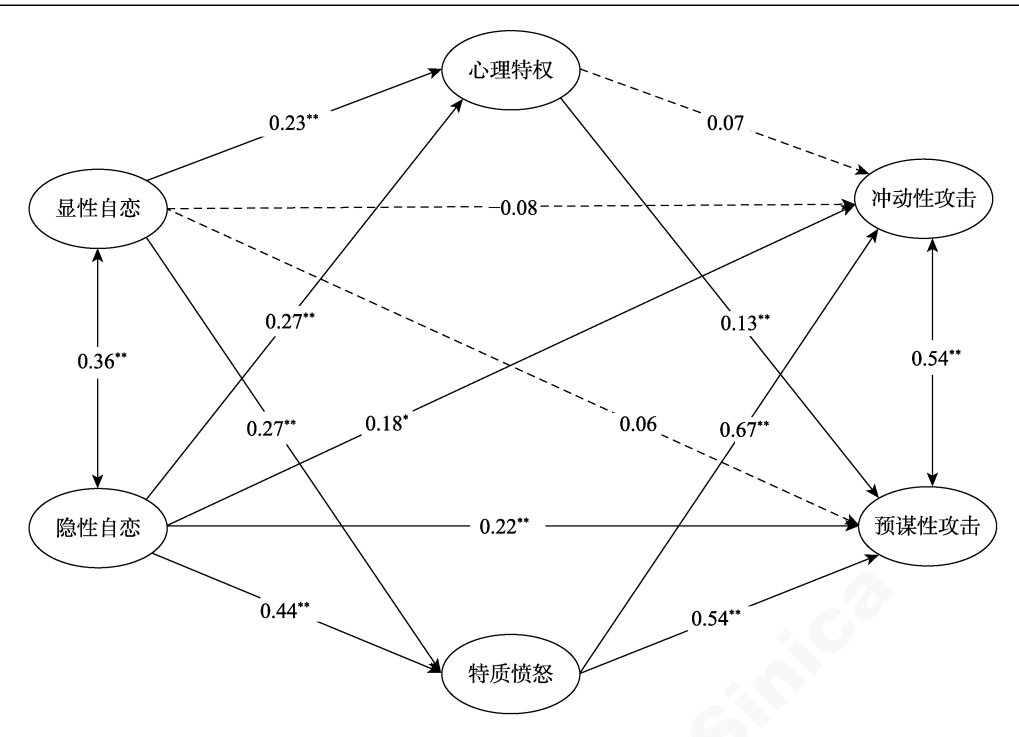


图 2　自恋与攻击多重中介作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图

注：为保持简洁，仅保留了结构模型，省略了测量模型。潜变量到显变量的路径系数均在 0.52~0.97 之间。图中系数均为标准化系数。

表 3　主要效应量显著性的 bootstrap 检验

编号	路径	标准化效应量	*SD*	95% CI
中介效应 1	隐性自恋→特质愤怒→冲动攻击	0.30	0.05	[0.195, 0.400]
中介效应 2	隐性自恋→特质愤怒→预谋攻击	0.24	0.05	[0.151, 0.335]
中介效应 3	隐性自恋→心理特权→冲动攻击	0.02	0.02	[−0.013, 0.052]
中介效应 4	隐性自恋→心理特权→预谋攻击	0.04	0.02	[0.006, 0.075]
中介效应 5	显性自恋→特质愤怒→冲动攻击	0.18	0.06	[0.077, 0.302]
中介效应 6	显性自恋→特质愤怒→预谋攻击	0.15	0.04	[0.065, 0.232]
中介效应 7	显性自恋→心理特权→冲动攻击	0.02	0.02	[−0.010, 0.048]
中介效应 8	显性自恋→心理特权→预谋攻击	0.03	0.02	[0.006, 0.062]
直接效应 1	隐性自恋→冲动攻击	0.18	0.08	[0.035, 0.327]
直接效应 2	隐性自恋→预谋攻击	0.22	0.07	[0.091, 0.349]
直接效应 3	显性自恋→冲动攻击	−0.08	0.07	[−0.227, 0.063]
直接效应 4	显性自恋→预谋攻击	0.06	0.07	[−0.070, 0.196]

表 4　总效应量及差异显著性检验

总效应	包含路径	标准化效应量	*SD*	95% CI
1 隐性自恋预测冲动性攻击	中介效应 1+中介效应 3+直接效应 1	0.49	0.07	[0.344, 0.630]
2 隐性自恋预测预谋性攻击	中介效应 2+中介效应 4+直接效应 2	0.49	0.07	[0.352, 0.618]
3 显性自恋预测冲动性攻击	中介效应 5+中介效应 7+直接效应 3	0.12	0.08	[−0.035, 0.265]
4 显性自恋预测预谋性攻击	中介效应 6+中介效应 8+直接效应 4	0.23	0.07	[0.092, 0.378]

显著，且隐性自恋预测预谋性攻击的效应量显著大于显性自恋($\Delta\beta = 0.26$, $SE = 0.13$, 95% CI [0.004, 0.503], $p = 0.048$)。上述结果共同表明，隐性自恋对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的预测作用都大于显性自恋。

2.4　讨论

研究 1 通过问卷法，探索了暴力犯显性自恋、隐性自恋、特质愤怒、心理特权、冲动性攻击和预谋性攻击间的关系。根据自我威胁理论和自恋暴怒理论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并用 bootstrap 法进一步

检验了效应量的显著性。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对攻击的影响做了进一步的对比。

研究 1 在中国暴力犯群体中证实了自恋与攻击存在着正相关(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Rasmussen, 2016)。心理特权和特质愤怒在自恋与攻击间起中介作用，但心理特权的中介作用仅对预谋性攻击成立，对冲动性攻击不成立。隐性自恋预测两类攻击的效应量均大于显性自恋，这与 Rasmussen (2016)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再次突显出隐性自恋的非适应性(Schoenleber et al., 2011)。

研究 1 证实了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并提供了相应的解释，同时突出了隐性自恋的作用。但研究 1 采取问卷法，没有真实的情境，很多因素不能得到很好的体现，例如心理特权只能间接地体现个体感知到的威胁感，挑衅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验证。此外，自恋暴怒也并不是简单的愤怒，它是包含愤怒、悲伤等在内的复杂的负性情绪(Krizan & Johar, 2015)。研究 2 将采用实验法，在挑衅条件和无挑衅条件下分别探讨显性自恋、隐性自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及其机制的异同。

3 研究 2：实验研究

3.1 研究方法

3.1.1 被试

为获得更典型的暴力犯，研究 2 仅选取了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名的罪犯。根据监狱情况，仅在无生产任务或生产任务较轻的大队开展实验以保证被试能够配合完成。研究 2 为实验研究，采取被试间设计，被试被随机分为 2 组，完成挑衅组或非挑衅组的实验，我们对两组被试的基本信息及自恋人格进行了匹配，两组被试的各变量得分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详见表 5)。共有 93 名被试完成了实验，挑衅组 47 人，非挑衅组 46 人。其中 2 名非挑衅组被试和 1 名挑衅组被试对实验过程存在质疑，在分析过程中予以剔除，最终保留 46 名挑衅组被试和 44 名非挑衅组被试，其中故意杀人罪 50 人，故意伤害罪 40 人。

表 5 挑衅组与对照组基本信息与自恋人格得分($M \pm SD$)

变量	挑衅组	对照组	t	p
年龄	36.02 ± 5.57	35.59 ± 6.18	0.35	0.729
学历水平	1.83 ± 0.80	1.91 ± 0.71	0.52	0.604
原判刑期(年)	19.17 ± 7.65	19.02 ± 8.14	0.09	0.929
服刑时间(年)	5.84 ± 3.36	5.39 ± 3.92	0.57	0.567
显性自恋	1.93 ± 1.71	1.84 ± 1.71	0.26	0.795
隐性自恋	26.89 ± 5.31	25.45 ± 6.59	1.14	0.259

注：学历水平 1 = 小学，2 = 初中，3 = 高中或职业高中，4 = 专科、本科及以上；基于刑罚的实际执行情况，无期徒刑被赋值为 23 年，死缓被赋值为 25 年。

3.1.2 测量工具

操纵检验 对 Li 等(2016)研究中采用的敌意归因量表进行改编，测量被试对于对手的敌意认知，以此来检验挑衅的启动效果。该问卷包含 5 个题项，采用 1~7 点计分。题目包括“我感觉我的对手很友好” (反向计分)、“我觉得我的对手故意要伤害我”、“我的对手对我非常蛮横”、“我的对手对我很有敌意”、“我的对手对我抱有偏见”。得分越高表明被试感知到的敌意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

负性情绪 采用正性负性情绪量表(Positive affect negative affect schedule, PANAS)中的负性情绪量表来测量负性情绪(Watson et al., 1988)。该量表中文版信效度良好(黄丽 等, 2003)。包含 10 个情绪词，被试根据此时此刻的心情评估这些情绪词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在的心情。量表采取 1~5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此刻被试的负面情绪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

感知威胁感 感知威胁感的测量工具改编自 Bushman 和 Baumeister (1998)的研究，共计 4 个问题，“游戏结果和对手的评价对我很不公平”，“游戏结果和对手的评价让我觉得难堪”，“游戏结果和对手让我感受到了威胁”，“游戏结果和对手伤害了我的自尊心”，采取 1~7 点计分。得分越高表明个体感受到的威胁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1。

自恋人格 显性自恋与隐性自恋的测量工具与研究 1 相同。研究 2 中，显性自恋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75，隐性自恋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1。

3.1.3 实验任务与流程

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大学生为被试，由于用文字表达观点的能力是大学生较为擅长且十分看重的，研究者常常让被试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令伪被试针对文章及观点做消极评价来启动挑衅(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Jones & Paulhus, 2010)。但这一方法很难对文化水平较低的罪犯群体起到挑衅的作用，监狱内的被试甚至很难完成文章写作的任务。基于反应时竞争任务的泰勒攻击范式是测量攻击行为的常用方法(Chester & Lasko, 2019)。研究 2

根据本研究目的和监狱环境的特殊性对反应时竞争任务进行了改编, 具体流程如下。

根据人口学信息在监管系统中挑选名单, 排除无法或不愿参与实验的被试后, 其余被试由主试一对一解释指导语并完成实验。首先, 被试填写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问卷; 接着, 被试完成阶段 1, 进行挑衅的启动; 之后进行操纵检验及负性情绪和感知威胁感的测量; 最后进行阶段 2, 对攻击进行测量。实验结束后, 被试将被赠送一块香皂作为酬劳。

(1)被试填写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问卷。

(2)阶段 1。阶段 1 开始前, 被试被告知"你与一名来自其他监区的匿名对手(事实上是伪被试)进行反应速度比赛, 屏幕上会依次出现绿、黄、红三个颜色的方块, 前两个方块的持续时间随机在 0.8~2 s 之间, 你需要快速准确地在红色方块出现时按'空格键'做出反应, 游戏共计 2 个阶段, 每阶段 12 个回合, 每阶段总时长较短者会获得游戏的胜利。阶段 1 结束后, 会反馈游戏结果, 对手会根据游戏结果和你的表现对你做出评价"。该阶段的目的是启动挑衅, 被试被随机分为挑衅组和非挑衅组。在挑衅组中, 被试会被告知输掉了阶段 1 游戏, 且"对手"会给被试较低的评分(2 分, 满分 9 分), 并发送负面评价(例如, 你的反应实在太慢了; 再比你一次我还是会赢你); 在对照组中, 被试会被告知赢下了阶段 1 游戏, "对手"会给其较高的评分(8 分, 满分 9 分), 且会发送正面的评价(例如: 表现不错; 你的反应速度很快)。

(3)操纵检验和中介变量的测量。阶段 1 之后, 被试将被要求按照此时此刻的感受和心情完成操纵检验、负性情绪和感知威胁感的测量问卷。

(4)阶段 2。被试被告知"你与之前的对手再进行一轮游戏, 在每一回合结束后, 你可以给对手发送噪音"。每次对红色按键做出反应后, 被试可以依次选择噪音大小和持续时间以向对手施加噪音, 数字 1~9 代表 60~100 dB 的噪音(每 5 dB 一个水平), 0 则表示不施加噪音, 数字 0~9 代表 0.5~5 s (每 0.5 s 一个水平)。对噪音大小和持续时间分别标准化后将标准分相加, 作为攻击行为的量化指标(杨晨晨 等, 2016)。

3.1.4　数据分析

利用 SPSS 23.0 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 完成描述性统计和操纵性检验。在此基础上, 我们将自恋作为自变量, 负性情绪和感知威胁感为中介变量、攻击为因变量、挑衅为调节变量, 利用 SPSS 中的 process 组件(Hayes, 2013)进行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的检验, 探究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以及挑衅的调节作用和负性情绪、感知威胁感的中介作用。

3.2　结果

3.2.1　描述统计与操纵检验

相比于对照组, 挑衅组的被试感知到了更多来自对手的敌意, 证明挑衅的操纵成功。此外, 挑衅组被试有更强的负性情绪和威胁感以及更多的攻击行为(详见表 6)。

表 6　描述性统计及操纵检验($M \pm SD$)

变量	挑衅组	对照组	t	p	Cohen'd
敌意认知	14.93 ± 4.89	12.45 ± 4.48	2.50	0.014	0.53
负性情绪	19.00 ± 6.39	16.14 ± 4.81	2.39	0.019	0.51
威胁感	10.41 ± 4.45	8.30 ± 3.37	2.54	0.013	0.53
攻击行为	0.12 ± 2.01	–0.71 ± 1.25	2.33	0.022	0.50

3.2.2　显性自恋与攻击的关联

首先从总体上检验显性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利用 process 组件的 Model1, 将显性自恋为自变量, 攻击为因变量, 组别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挑衅对显性自恋与攻击行为的关联起调节作用(β = 0.24, SE = 0.10, t = 2.43, p = 0.017, 95% CI [0.043, 0.430])。在挑衅条件下, 显性自恋可以正向预测攻击行为(β = 0.50, SE = 0.14, t = 3.67, p = 0.004, 95% CI [0.230, 0.772]; 非挑衅条件下, 显性自恋不能预测攻击行为(β = 0.03, SE = 0.14, t = 0.19, p = 0.847, 95% CI [–0.250, 0.303])。调节作用的简单斜率分析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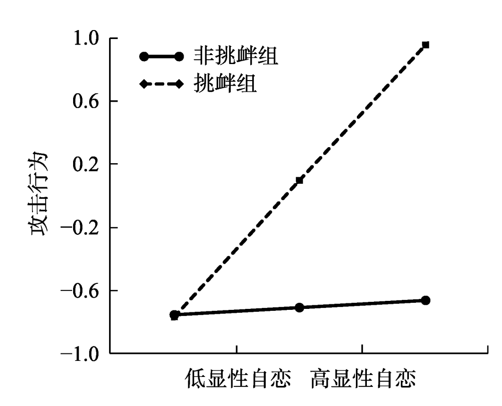


图 3　挑衅调节显性自恋与攻击关系的简单斜率图(总效应)

在此基础上, 将显性自恋为自变量, 负性情绪和感知威胁感为中介变量, 攻击为因变量, 组别为调节变量, 利用 process 的 Model7 构建有调节的多

重中介模型。结果表明，挑衅调节了显性自恋对负性情绪的预测作用(β = 0.20, *SE* = 0.10, 95% CI [0.004, 0.408])，同时调节了显性自恋→负性情绪→攻击的中介路径(β = 0.13, *SE* = 0.07, 95% CI [0.018, 0.301])。在挑衅条件下，显性自恋可以预测负性情绪(β = 0.35, *SE* = 0.14, *t* = 2.48, *p* = 0.015, 95% CI [0.069, 0.631])，且上述中介效应成立(β = 0.11, *SE* = 0.06, 95% CI [0.022, 0.253])，无挑衅条件下，显性自恋无法预测负性情绪(β = –0.06, *SE* = 0.14, *t* = –0.40, *p* = 0.688, 95% CI [–0.345, 0.228])，且上述中介效应不成立(β = –0.02, *SE* = 0.04, 95% CI [–0.098, 0.047])。简单斜率分析图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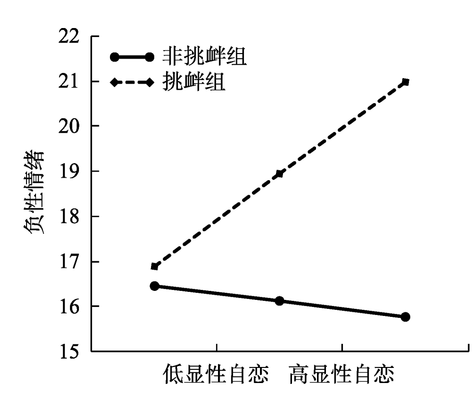


图 4　挑衅调节显性自恋与负性情绪关系的简单斜率图

显性自恋对威胁感的影响不受挑衅调节(β = 0.04, *SE* = 0.10, 95% CI [–0.157, 0.229])，显性自恋→威胁感→攻击的中介作用路径也不受挑衅调节(β = 0.02, *SE* = 0.05, 95% CI [–0.073, 0.133])。在挑衅条件下，自恋可以预测威胁感(β = 0.38, *SE* = 0.14, *t* = 2.79, *p* = 0.007, 95% CI [0.109, 0.651])；且上述中介效应成立(β = 0.09, *SE* = 0.06, 95% CI [0.002, 0.233])。非挑衅条件下，自恋同样可以预测威胁感(β = 0.31, *SE* = 0.14, *t* = 2.22, *p* = 0.029, 95% CI [0.032, 0.584])，上述中介效应依然成立(β = 0.08, *SE* = 0.05, 95% CI [0.002, 0.186])。简单斜率分析图见图 5。此外，显性自恋对攻击的直接效应不显著(β = 0.14, *SE* = 0.10, 95% CI [–0.053, 0.329])。

3.2.3　隐性自恋与攻击的关联

采用相同的方法检验隐性自恋与攻击行为关联的机制，首先利用process中的模型1检验挑衅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隐性自恋对攻击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31, *SE* = 0.11, 95% CI [0.083, 0.508])，但挑衅对二者关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β = 0.02, *SE* = 0.10, *t* = 0.20, *p* = 0.841, 95% CI [–0.185, 0.227])。利用 process 的 model7 构建有调节的多重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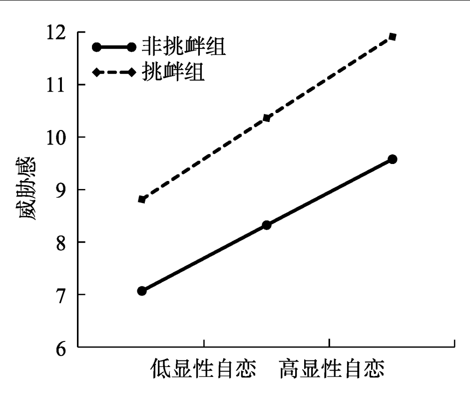


图 5　挑衅调节显性自恋与威胁感关系的简单斜率图

结果表明，挑衅对隐性自恋→负性情绪→攻击的中介路径(β = 0.03, *SE* = 0.07, 95% CI [–0.084, 0.191])和隐性自恋→威胁感→攻击的中介路径(β = 0.02, *SE* = 0.06, 95% CI [–0.096, 0.155])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由于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我们将模型简化为一般的多重中介模型，采用 Process 插件的 Model4 检验威胁感和负性情绪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威胁感的中介作用成立(β = 0.11, *SE* = 0.05, 95% CI [0.028, 0.222])，负性情绪的中介效应成立(β = 0.13, *SE* = 0.07, 95% CI [0.014, 0.281])，隐性自恋的直接作用不成立(β = 0.07, *SE* = 0.10, *t* = 0.69, *p* = 0.494, 95% CI [–0.135, 0.278])。

3.3　讨论

在研究 1 的基础上，研究 2 对方法和内容进行了改进和补充，进一步在罪犯群体中探索自恋与攻击的关系及其机制。我们针对监狱环境和罪犯群体的特点，对攻击的反应时竞争任务进行了改编，检验了挑衅和非挑衅条件下显性自恋、隐性自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负性情绪及感知威胁感的中介作用。

个体受到挑衅时，显性自恋与攻击行为存在显著关联，负性情绪和威胁感的中介作用成立；不受挑衅时，总体上显性自恋与攻击的关联不显著，但威胁感的中介效应仍然存在。这表明挑衅是引发高显性自恋者攻击的重要因素，负性情绪和威胁感为这种关系提供了解释。但即使没有受到实际的挑衅，高显性自恋者在人际互动过程中，也会倾向于感到难堪、没面子或受到威胁，导致其采用攻击行为挽回面子、消除威胁。这样的结果部分符合 Reidy 等人(2010)的观点，即自恋与攻击的关联未必需要挑衅的诱发。隐性自恋的结果更好地印证了这一点，在挑衅与非挑衅条件下，隐性自恋预测攻击行为的总效应量均显著，威胁感和负性情绪也都起到了中介作用。这同时意味着隐性自恋者比显性自恋者更

容易产生攻击行为，与研究 1 和 Krizan 和 Johar (2015)及 Rasmussen (2016)的结果一致。

4 总讨论

自恋在个人主义盛行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与精神病态和马基雅维利主义并称黑暗三人格，被认为与反社会人格和行为有密切的关联(Paulhus & Williams, 2002)。但有研究者认为对黑暗三人格，尤其是自恋的“黑暗性”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确认(Rauthmann, 2012)。例如，在预测青少年不良行为时，自恋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预测效果(Chabrol et al., 2009)；公众对于自恋者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积极评价(Rauthmann, 2012)。加上自恋受社会文化影响较大(Li et al., 2016)，中国人内敛中庸的传统和集体主义文化使得个体自恋特点可能与西方社会存在着差异。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及机制进行了研究，对自恋与攻击的亚型进行了区分，检验了挑衅在自恋与攻击间的调节作用并以自我威胁理论和自恋暴怒理论为依据对其机制进行了解释。更为重要的是，本研究选取了暴力犯为研究对象，弥补了以往研究在正常人群，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中研究“黑暗人格”和“反社会行为”的局限。

4.1 威胁感和负面情绪的中介作用

与以往多数研究一致，本研究中自恋与攻击存在正相关(Hart, Adams, & Tortoriello, 2017; Lambe et al., 2018)。同时，心理特权/感知威胁感和特质愤怒/负面情绪在二者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印证了自我威胁理论(Bushman & Baumeister, 1998)和自恋暴怒理论(Krizan & Johar, 2015)，从认知和情绪角度对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做出了解释：自恋者膨胀的自我使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容易产生认知和情绪的异常，感到自我受到威胁并体验到强烈的负性情绪，为了消除威胁、找回面子，同时在负性情绪的驱使下，会产生攻击行为。

一方面，本研究发现，以心理特权为代表的认知成分，仅能解释自恋对预谋性攻击的影响，对冲动性攻击的中介作用不成立。这样的结果符合自我威胁理论对自恋攻击关系的解释，认为自恋者的攻击行为是带有目的性且有预谋的(Hart, Adams & Tortoriello, 2017)。自恋者以自我为中心，对自己有膨胀的认知，认为自己应当享有更多的权利和优待，有较强的心理特权感(Campbell et al., 2004)。现实中，个体越认为自己应当享有特权，就意味着他们的期望越容易被违背(Reidy et al., 2008)，从而感受到威胁或不公平。根据自我威胁理论，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和地位，消除威胁并实现特权，会采取攻击行为(Bushman & Baumeister, 1998)。这种攻击有明确的目的而非因为冲动，因此，心理特权等认知方面的因素，只能中介自恋对预谋性攻击而非对冲动性攻击的影响。

另一方面，与 Krizan 和 Johar (2015)提出的自恋暴怒理论一致，特质愤怒及其代表的情绪因素能够较好地预测自恋者的冲动性攻击。自恋者被他人激惹或自我受到挑战后，会产生强烈的愤怒等负性情绪，致使情绪及行为失控，产生冲动性攻击。但本研究还发现，负面情绪对暴力犯的预谋性攻击同样存在着预测作用。这说明愤怒对暴力犯攻击性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即时、短暂的，愤怒还会增加个体对他人的敌意认知并形成愤怒沉思(侯璐璐 等, 2017)，使个体长期处于敌意和愤怒的状态，不断驱使个体实施有目的的攻击直到实施报复行为或宣泄情绪。罪犯人群的情绪调节功能存在异常(Garofalo & Velotti, 2017)，其对情绪的消极应对方式，也会加深负性情绪带来的影响(van Harreveld et al., 2007)。这使得负性情绪对暴力犯的影响更深远且消极，持续驱使着个体实施报复行为，形成目的性和计划性较强的预谋性攻击。

4.2 挑衅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挑衅对上述的中介模型起到了调节作用，即在挑衅条件下，自恋者更容易产生威胁感和负性情绪，进而引发攻击行为。这一结果得到了大量研究(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Li et al., 2015)和元分析的支持(Rasmussen, 2016)。但不同的是，本研究中挑衅只对部分中介路径起调节作用，即使没有受到挑衅，显性和隐性自恋者也都会感受到较强的威胁感，隐性自恋者还会产生与受到挑衅时相似的负面情绪。尽管 Reidy 等(2010)的研究得到过类似的结果，但这与大多数以正常人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Bushman & Baumeister, 1998; Jones & Paulhus, 2010; Rasmussen, 2016)。这样的结果可能与暴力犯群体的特征有关。自恋者本就容易从外界感受到敌意和威胁(Reidy et al., 2008)，隐性自恋者更是具有情绪不稳定的特点(Miller et al., 2011)，而以暴力犯为代表的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个体比一般人更容易产生敌意和负面情绪，同时具有对挑衅过度关注的特点(刘宇平 等, 2019)，这使得暴力犯人群在低挑衅情境下也可能感觉受到挑衅，发生认

知和情绪上的变化，引发攻击行为。另外，暴力犯的自我控制水平较低，刘宇平等人(2019)的研究表明，自我控制与挑衅对攻击行为影响的交互作用达到边缘显著，预示着低自我控制的个体更容易感知到挑衅而产生攻击行为。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在暴力犯群体中，挑衅的调节作用与正常人群中的结果存在差异。

4.3 隐性自恋的“黑暗性”

本研究中，相比于显性自恋，隐性自恋能够更好地预测攻击行为。首先，研究 1 表明，隐性自恋对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的效应量均大于显性自恋。显性自恋仅对预谋性攻击有显著预测作用，对冲动性攻击的总效应区间包含 0，这印证了 Barry 等人(2007)及 Fossati 等人(2010)的观点。显性自恋对冲动性攻击存在着一定的负向直接作用，与特质愤怒的中介作用形成了遮掩效应。这说明，尽管显性自恋者也存在着易愤怒的特点并可能因此产生冲动性攻击，但他们出于维护自身形象地位考虑，往往会控制自己的冲动，很少采取冲动性攻击这种公然明显的攻击(Baughman et al., 2012; Maples et al., 2014)，而选择“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方式进行有计划和预谋的攻击行为。同时，研究 2 表明，在不受挑衅时，隐性自恋也能够预测攻击行为，这样的结果与以往的一些研究和观点相一致。余震坤等(2019)提出，显性自恋既存在非适应性的特点，也存在适应性的一面，例如与主观幸福感正相关(王晓燕, 2008)等；隐性自恋则更多代表了自恋的病态和消极面(Schoenleber et al., 2011)，具有脆弱敏感及情绪不稳定的特点(Miller et al., 2011)，与攻击行为的关联更大(Rasmussen, 2016)。在研究过程中如果不加以区分，很容易产生混淆。

隐性自恋者具备自大、傲慢、对自身过度关注等自恋的核心特点，都是自恋的重要组成部分(Hendin & Cheek, 1997; Wink, 1991)。但《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及人格心理学中最常用的自恋测量工具 NPI (Gentile et al., 2013)中，均未包含隐性自恋的内容，黑暗三人格及其测量工具同样对隐性自恋缺乏关注(Maples et al., 2014)，隐性自恋与攻击行为关联的研究也相对较少(Lambe et al., 2018; Rasmussen, 2016)。而本研究和以往研究(Krizan & Johar, 2015; Rasmussen, 2016)都表明隐性自恋能更好地预测攻击行为。上述现象体现了在自恋领域的研究中，对隐性自恋存在着不合理的忽视，导致了研究者对自恋与攻击关联及自恋“黑暗性”的争议(Rauthmann, 2012)。也提示我们今后在研究自恋与攻击等非适应性行为或反社会行为的关系时，要对显性自恋和隐性自恋加以区分，并增加对隐性自恋的关注。

4.4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研究 1 的问卷法和研究 2 的实验法都把自恋当作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进行测量，这是人格与社会心理学领域中研究自恋的普遍做法(Jones & Paulhus, 2010; Krizan & Johar, 2015)。但这使得自恋并非实验操纵的结果，得到的因果关系不够明确。Giacomin 和 Jordan (2014)认为自恋具有一定的状态性，并提出了操纵状态自恋的范式，今后的研究可以从状态自恋角度入手，对自恋进行操纵以获得更确切的因果关系。第二，挑衅的调节作用和自我威胁及自恋暴怒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自恋与攻击的关联及机制问题。但挑衅存在着多种类型，例如对个体的身体(body)和自我(ego)进行挑衅时，自恋与攻击的关联会有所不同(Jones & Paulhus, 2010)。同时有研究者认为还存在着其他理论可以解释自恋与攻击的关联。例如，除认知和情绪外，一般攻击模型还提到了唤醒(arousal)在解释攻击行为时的作用(Anderson & Bushman, 2002)，今后可以将相应的生理指标纳入研究中；还有研究者认为自恋者的攻击本质上是一种获取资源，掌控主动的手段(Hart, Adams, Burton, & Tortoriello, 2017)，甚至可能是为了获得施虐带来的快感(Buckels et al., 2013)，这在反社会倾向较强的罪犯群体中可能表现地更加明显。最后，研究 1 区分了攻击的属性，但研究 2 受监狱内实验条件和被试量的限制，没有对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做进一步区分。

尽管存在上述缺陷，本研究通过问卷法和实验法，在罪犯群体中对自恋人格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做了详细地探讨，结果相对可靠，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本研究发现，自恋及其引发的威胁感和负面情绪会增加攻击行为。在监狱管理和罪犯矫治过程中，应当使罪犯减少对自身的过度关注，采用认知行为疗法等手段帮助他们形成对自己和外部世界的合理认知，并增强情绪管理能力以减少攻击行为。隐性自恋者往往伴随着低自尊(Schoenleber et al., 2011)，因此提升罪犯自尊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青少年处于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在青少年教育及犯罪预防过程中，家庭和学校应引

导青少年建立对挫折和批评的合理应对方式, 并学会关注和理解他人, 避免其形成对自己不合理的过度关注及脆弱敏感的人格特点。

5　结论

本文通过 2 个研究在中国暴力犯人群中探讨了自恋与攻击的关系及其相应机制, 得到如下结论: (1)暴力犯的自恋可以预测攻击行为, 威胁感和负性情绪在其中起多重中介作用, 其中威胁感主要预测预谋性攻击, 负性情绪则对预谋性和冲动性两类攻击均有良好的预测作用。(2)挑衅对上述过程起调节作用, 在挑衅条件下, 自恋与攻击的关联更密切。(3)隐性自恋比显性自恋更具有黑暗性: 隐性自恋对预谋性攻击和冲动性攻击的预测效应量均大于显性自恋, 且在无挑衅条件下也会产生攻击行为。

参　考　文　献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nderson, C. A., & Bushman, B. J. (2002). Human aggress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3*(1), 27–51.

Bai, Y., & Wang, J. N. (2018).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scale in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y: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6*(12), 752–759

[白杨, 王佳宁. (2018). 心理特权量表在中国大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心理技术与应用, 6*(12), 752–759.]

Barry, T. D., Thompson, A., Barry, C. T., Lochman, J. E., & Hill, K. (2007). The importance of narcissism in predicting proactive and reactive aggression in moderately to highly aggressive children. *Aggressive Behavior, 33*(3), 185–197.

Baughman, H. M., Dearing, S., Giammarco, E., & Vernon, P. A. (2012). Relationships between bullying behaviours and the dark triad: A study with adult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52*(5), 571–575.

Buckels, E. E., Jones, D. N., & Paulhus, D. L. (2013). Behavioral confirmation of everyday sadism.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11), 2201–2209.

Bushman, B. J., & Baumeister, R. F. (1998). Threatened egotism,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direct and displaced aggression: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lead to viol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1), 219–229.

Bushman, B. J., Baumeister, R. F., Thomaes, S., Ryu, E., & West, S. G. (2009). Looking again, and harder, for a link between low self-esteem and agg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7*(2), 427–446.

Campbell, W. K., Bonacci, A. M., Shelton, J., Exline, J. J., & Bushman, B. J. (2004). Psychological entitlement: Interpersonal consequences and validation of a self-report meas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83*(1), 29–45.

Chabrol, H., van Leeuwen, N., Rodgers, R., & Séjourné, N. (2009). Contributions of psychopathic, narcissistic, Machiavellian, and sadistic personality traits to juvenile delinquency.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7*(7), 734–739.

Chen, G. M. (2015). Losing face on social media: Threats to positive face lead to an indirect effect on retaliatory aggression through negative affec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6), 819–838.

Chester, D. S., & Lasko, E. N. (2019). Validating a standardized approach to the Taylor aggression paradigm.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0*(5), 620–631.

Fossati, A., Borroni, S., Eisenberg, N., & Maffei, C. (2010). Relations of proactive and reactive dimensions of aggression to overt and covert narcissism in nonclinical adolesc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36*(1), 21–27.

Garofalo, C., & Velotti, P. (2017). Negative emotionality and aggression in violent offender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otion dysregulation.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51*, 9–16.

Gentile, B., Miller, J. D., Hoffman, B. J., Reidy, D. E., Zeichner, A., & Campbell, W. K. (2013). A test of two brief measures of grandiose narcissism: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13 and the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16.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5*(4), 1120–1136.

Giacomin, M., & Jordan, C. H. (2014). Down-regulating narcissistic tendencies: Communal focus reduces state narcissism.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0*(4), 488–500.

Hart, W., Adams, J. M., Burton, K. A., & Tortoriello, G. K. (2017). Narcissism and self-presentation: Profiling grandiose and vulnerable narcissists' self-presentation tactic us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4*, 48–57.

Hart, W., Adams, J. M., & Tortoriello, G. K. (2017). Narcissistic responses to provo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the rage and threatened-egotism account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6*, 152–156.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based approach.* New York, USA: Guilford Press.

Hendin, H. M., & Cheek, J. M. (1997). Assessing hypersensitive narcissism: A reexamination of Murray's narcism scal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1*(4), 588–599.

Hou, L. L., Jiang, Q., Wang, H. Z., & Li, C. R. (20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it anger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ve cognitive model.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49*(12), 1548–1558.

[侯璐璐, 江琦, 王焕贞, 李长燃. (2017). 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影响: 基于综合认知模型的视角. *心理学报, 49*(12), 1548–1558.]

Huang, L., Yang, T. Z., & Ji, Z. M. (2003).Applicability of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in Chinese.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17*(1), 56–58.

[黄丽, 杨廷忠, 季忠民. (2003). 正性负性情绪量表的中国人群适用性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7*(1), 56–58.]

Jones, D. N., & Paulhus, D. L. (2010). Different provocations trigger aggression in narcissists and psychopath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1), 12–18.

Krizan, Z., & Johar, O. (2015). Narcissistic rage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8*(5), 784–801.

Lambe, S., Hamilton-Giachritsis, C., Garner, E., & Walker, J. (2018). The role of narcissism in aggression and violence: A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2), 209–230.

Li, J.-B., Nie, Y.-G., Boardley, I. D., Dou, K., & Situ, Q.M. (2015). When do normative beliefs about aggression predict aggressive behavior? An application of I3 theory. *Aggressive Behavior, 41*(6), 544–555.

Li, C., Sun, Y., Ho, M. Y., You, J., Shaver, P. R., & Wang, Z.

(2016). State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s of anger and hostile attributional bias. *Aggressive Behavior, 42*(4), 333−345.

Liu, Y. P., Zhao, H., Li, S. S., Zhang, Z., & Yang, B. (2019). The neurobiological evidence of 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 and its judicial implication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0), 1726–1742.

[刘宇平, 赵辉, 李姗珊, 张卓, 杨波. (2019). 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及其司法启示. *心理科学进展 27*(10), 1726–1742.]

Luo, Y. L., & Zhang, D. J. (2011). Experimental study of attentional bias to negative emotion facial expressions in high trait anger individuals.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2): 322–327.

[罗亚莉, 张大均. (2011). 高特质愤怒个体对负性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实验研究. *心理科学, 34*(2), 322–327.]

Maples, J. L., Lamkin, J., & Miller, J. D. (2014). A test of two brief measures of the dark triad: The Dirty Dozen and Short Dark Triad.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6*(1), 326–331.

Miller, J. D., Hoffman, B. J., Gaughan, E. T., Gentile, B., Maples, J., & Campbell, W. K. (2011). Grandiose and vulnerable narcissism: A nomological network analysi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9*(5), 1013–1042.

Miller, J. D., & Maples, J.. (2012). Trait personality models of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grandiose narcissism, and vulnerable narcissism. *The Handbook of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Disorder*. John Wiley & Sons, Inc.

Paulhus, D. L., & Williams, K. M. (2002). The dark triad of personality: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36*(6), 556–563.

Qiao, Y., Xie, B., & Zhang, M. D. (2009). The Chinese version of 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 in adolescents with aggression: Its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Chinese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al and Brain Science, 18*(04), 366–368.

[乔屹, 谢斌, 张明岛. (2009). 冲动-预谋性攻击行为量表中文版的信效度检验.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18*(4), 366–368.]

Qin, F., & Xu, F. (2013). Review on the studies of the dark triad.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7), 1248–1261.

[秦峰, 许芳. (2013). 黑暗人格三合一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1*(7), 1248–1261.]

Rasmussen, K. (2016). Entitled vengeance: A meta-analysis relating narcissism to provoked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42*(4), 362–379.

Rauthmann, J., F. (2012). The dark triad and 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social consequences of narcissism, Machiavellianism, and psychopathy. *Social Psychological & Personality Science, 3*(4), 487–496.

Reidy, D. E., Foster, J. D., & Zeichner, A. (2010). Narcissism and unprovoked aggression. *Aggressive Behavior, 36*(6), 414–422.

Reidy, D. E., Zeichner, A., Foster, J. D., & Martinez, M. A. (2008). Effects of narcissistic entitlement and exploitativeness on human physical aggression.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4*(4), 865–875.

Schoenleber, M., Sadeh, N., & Verona, E. (2011). Parallel syndromes: Two dimensions of narcissism and the facets of psychopathic personality in criminally involved individuals. *Personality Disorders, 2*(2), 113–127.

Spielberger, C. D. (1988). *State-trait anger expression inventory (STAXI) (Research edition)*. Odessa, FL: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Resources.

Stanford, M. S., Houston, R. J., Mathias, C. W., Villemarette-Pittman, N. R., Helfritz, L. E., & Conklin, S. M. (2003). Characterizing aggressive behavior. *Assessment, 10*(2), 183–190.

van Harreveld, F., van der Pligt, J., Claassen, L., & van Dijk, W. W. (2007). Inmate emotion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The use of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Criminal Justice and Behavior, 34*(5), 697–708.

Wang, X. Y. (2008).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college students' 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on self-esteem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China.

[王晓燕. (2008). *大学生自恋人格对自尊和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 西安.]

Watson, D., Clark, L. A., & Tellegen, A. (1988).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brief measure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The panas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6), 1063–1070.

Wink, P. (1991). Two faces of narciss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61*(4), 590–597.

Wu, Y., & Wen, Z. L.(2011). Item parceling strategies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12): 1859–1867.

[吴艳, 温忠麟. (2011). 结构方程建模中的题目打包策略. *心理科学进展, 19*(12), 1859–1867.]

Yang, C. C., Li, C. N., Wang, Z. H., & Bian, Y. F. (2016). The mediational roles of perceived threat, anger, and hostile attribution bias between state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32*(02), 236–245.

[杨晨晨, 李彩娜, 王振宏, 边玉芳. (2016). 状态自恋与攻击行为——知觉到的威胁、愤怒情绪和敌意归因偏差的多重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2*(02), 236–245.]

Yu, Z. K., Liu, Y. Z., Luo, Y., & Cai, H. J. (2019). Adaptive narcissism and maladaptive narcissism: Diverse evidences for the distinction.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7*(1), 96–105.

[余震坤, 刘云芝, 罗宇, 蔡华俭. (2019). 区分适应性自恋和非适应性自恋: 多视角的证据. *心理科学进展, 27*(1), 96–105.]

Zhou, H., & Long, L. R. (2004). Statistical remedie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6): 942–950.

[周浩, 龙立荣. (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Eliminating threat or venting rag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in violent offenders

LIU Yuping[1], LI Shanshan[2], HE Yun[2], WANG Doudou[2], YANG Bo[2]

([1] *School of Criminal Justic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2] *School of Sociology,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Narcissism is a component of “the dark triad” and it is closely related to maladaptive and even antisocial behaviors. Aggressive behavior is a typical anti-social behavior, and serious aggression constitutes violent crime. Narcissism is often divided into grandiose and vulnerable narcissism. Aggression also has many subtypes, such as premeditated and impulsive aggression. Previous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narcissists are aggressive, especially when facing provocation. On the one hand, narcissists feel threatened when they are challenged. To maintain their ego and eliminate threat, narcissists may show aggressive behavior, which is explained by the theory of threatened egotism. On the other hand, when challenged, narcissists also show strong negative emotions because of their inflated but fragile ego, leading to out-of-control behaviors and even triggering them to attack others, which is the so-called “narcissistic rage.” However, most studies are in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participants are mainly college students. Most judicial field studies use questionnaires, and experimental studies to confirm the relation of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are lacking. The mechanism how they operate is also unknown. Previous studies failed to make distinctions of the subtypes of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especially the subtype of vulnerable narcissism.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with a questionnaire in experiment 1 and analyzed the manipulating function of provocation with a competitive response time in experiment 2.

In study 1, we administered the Narcissism Personality Inventory-13, Hypersensitivity Narcissistic Scale, The Trait Anger Scale, Entitlement Scale, and Impulsive/Premeditated Aggression Scales in 498 violence offenders to establish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n, the significance of effects was examined using Bootstrap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and its mechanisms. In study 2, we recruited 90 violent offenders for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 Participa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a provocation group (n = 46) and a no-provocation group (n = 44). Participants in both groups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for narcissism. Then, they finished the first stage to manipulate provocation. Participants were told to compete with another participant (a fake participant) in racing the speed of reactions. In the provocation group, participants lost the game and received negative feedback from their rivals; in the no-provocation group, participants won the game and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ir rivals. Then, they completed the questionnaire for manipulation testing and measured negative affect and perceived threat for the mediating variables. Finally, they finished the second stage in which they could send their rivals’ noises,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aggressive indicator.

Experiment 1 showed that narcissism can predict aggression and that the trait anger and entitlement play multiple mediating roles. Significant effects were found in the mediating paths of grandiose/vulnerable narcissism→trait anger→premeditated aggression, grandiose/vulnerable narcissism→trait anger→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grandiose/vulnerable narcissism→entitlement→premeditated aggression. However, the effect of the mediating path grandiose/vulnerable narcissism→entitlement→impulsive aggression was not significant. Compared with grandiose narcissism, vulnerable narcissism was a stronger indicator of premeditated and impulsive aggression. Experiment 2 showed that under provocation, grandiose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exhibited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Meanwhile, perceived threat and negative affect served a mediating function. Grandiose narcissism cannot predict aggression behaviors if not provoked, but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threat was still significant. For vulnerable narcissism, the influence on aggression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threat and negative affect were all significant whether provoked or no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two experiments: (1)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was still effective in violent offenders in Chinese culture; (2) "Threatened egot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 could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In specific, "threatened egotism" could predict premeditated aggression rather than impulsive aggression, and "narcissistic rage" could predict both subtypes of aggression; and (3) Vulnerable narcissism was non-adaptive, exerting a larger effect size on aggression and a wider applicability compared with grandiose narcissism. Researche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effects of vulnerable narcissism on maladaptive behaviors, such as aggression, and distinguish the subtypes of narcissism and aggression. Furthermore, the above results could be used in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and the management and correction of criminals by judicial practice departments.

Key words narcissism, threatened egotism, negative affect, aggressive, violent offender